

Zhu Rongj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朱鎔基傳

朱鎔基與現代中國的轉型

朱鎔基傳

ZHU RONGJ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朱 鎔 基 與 現 代 中 國 的 轉 型

[美] 龍安志 (Laurence J. Brahm) 著

丁力 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責任編輯 丁志紅
裝幀設計 彭若東
責任校對 江蓉甬
排 版 潘斯麗
印 務 馮政光

書 名 **朱鎔基傳——朱鎔基與現代中國的轉型**

書名原文 Zhu Rongj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叢 書 名 20 世紀中國

作 者 [美] 龍安志 (Laurence J. Brahm)

譯 者 丁力

出 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4 室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 (廣東) 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12 年 1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 開 (168mm×230mm) 360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5881-0-4

© 2012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Zhu Rongj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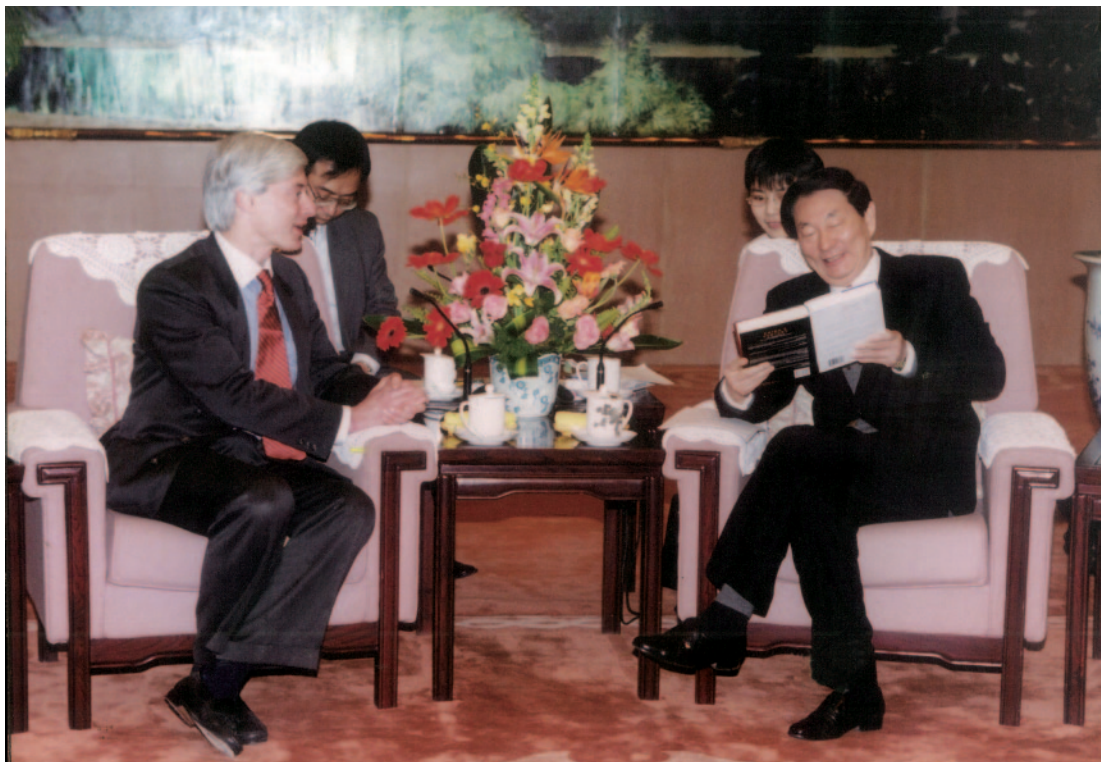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02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朱鎔基總理正在人民大會堂接待前來討論中國經濟問題的本書作者龍安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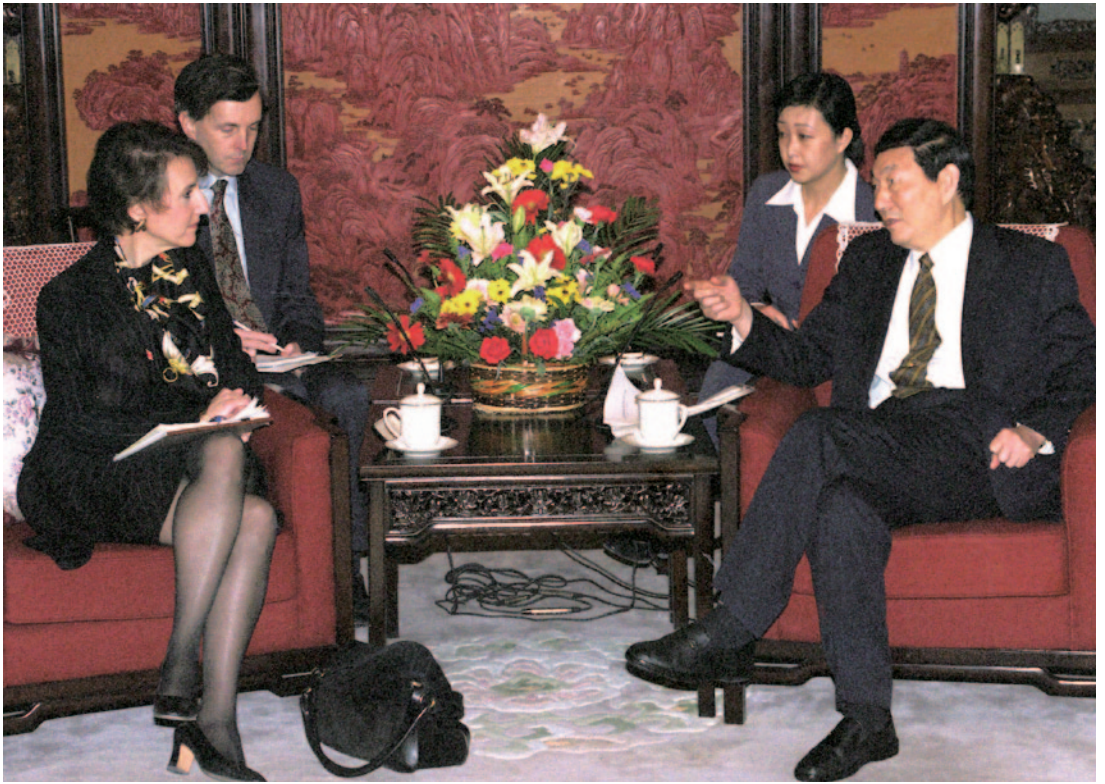


此照片捕捉到了朱鎔基總理難得一見的笑容。當時，本書作者龍安志將其著作《中國的世紀》呈給曾親自為這本書作序的朱總理。朱總理捧著書問：“為甚麼英文版的封面設計比中文版的要好看？”龍安志回答：“兩個封面設計得都好，只是面向的市場不同而已。”朱總理聽後不禁笑了起來。



199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在中南海同參加省部級幹部金融改革與發展專題研究班的學員座談。

(新華社新聞信息中心提供圖片，新華社記者樊如鈞攝)



1999年3月4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北京中南海會見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

(新華社新聞信息中心提供圖片，新華社記者劉少山攝)



2001年1月14日，全國銀行、證券、保險工作座談會在北京中南海舉行。朱鎔基總理出席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新聞信息中心提供圖片，新華社記者齊鐵硯攝）

Contents

目 錄

致謝	19
序言	25
前言	27
引言	31
楔子	33

第一部分 受管理的市場化

第一章 失控的經濟	51
失眠	52
“群眾運動”經濟學	54
價格控制的成本	57
成長的痛苦	58
與“市場”過招	61
起飛或崩潰的邊緣	63
16條措施	67

	評估金融風險	76
	緊縮貨幣政策	77
	負責指揮	81
第二章	三角債解剖	85
	大魚的故事	86
	中國三角債的源頭	87
	從短缺到擺闊消費	88
	製造信貸緊縮	90
	注視金融風暴陰雲	92
	一塊錢結清三塊錢	94
	一塊錢製造三塊錢的債	95
	“不要再用‘三角債’！明白嗎？”	97
	採用信號經濟學	99
	重組複雜關係	102
	降低利率	106
	把債務變沒了的魔法表演	109
	從帽子裡拿出信用	112
	重新包裝債務	115
第三章	一家違規金融機構的死亡	119
	債務醜聞	120
	醞釀中的風暴	121
	解剖一家國際信託投資公司	124
	紅色資本的傷感小調	130
	制止違規行為	133
	喪鐘為誰而鳴	135
	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生存還是毀滅？	137
	永別了，融資窗口	140

	“殺死”一家國際信託投資公司	143
	慈悲為懷	146
	一條建議	147
第四章	危機管理	149
	升起了颱風信號	150
	沙漠之旅	152
	漩渦中的中國	154
	應對危機	156
	刺激經濟增長	159
	外匯管制	161
	審視戰略	163
	遠大前程	165
	貶值還是不貶值？	167
	幕後政策推演	170
	平衡選擇	171
	朱鎔基私下的想法	173
	“華盛頓共識”的任人唯親	176
	動機不明	178
	觀點混亂	180
	克服危機	182
第五章	受管理的市場化	187
	宏觀調控經濟學的出現	188
	管理市場經濟	190
	乏味的報告有意思了	193
	利率政策的煉金術	195
	以糧為綱	198
	宏觀調控市場化	200

消費的價格	201
管理中國市場	203
朱鎔基新政	204
受管理的增長	207
設計規劃	210
假日經濟	212
宏觀調控政策的特權	213
超越計劃，進入市場管理	215
走向受管理的市場化	217

第二部分 改革之“道”

第六章 寄厚望於金融改革	221
流通現金	222
控制現金	223
掌握控制權	225
改革金融體制	226
中央銀行中央化	226
重組銀行系統	228
改變外匯機制	231
實行管理浮動	233
貨幣政策工具	235
控制利息收入	237
不再有假鈔	238
重新定義銀行	239
系統弊病	241

	沒有結束的生意	242
第七章	再造鐵鏽地區	245
	一個和煦的春日	246
	一個寒冷、鏽蝕的省份	249
	仲夏重組	250
	處理轉型問題	252
	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255
	鏽蝕地帶的合理化調整	257
	派出百名巡視員	259
	失去的機會	260
	小是美的	263
	鼓勵“私營經濟”發展	266
	雇用失業者	270
	吃企業	273
第八章	精簡政府機構	277
	政府職能合理化的需要	278
	現狀	279
	沒有計劃的計劃	281
	從指令到協調	283
	走向取消計劃	285
	政府全面改組	286
	政府機構合理化	287
	不再扯皮	288
	地方政府改革	291
	清理亂局	292
	不能令人滿意的結果	293
	抓住基層的根基	294

第九章 “五項改革”	297
提高工作水平	298
下崗底線	299
糧食流通體制改革	301
從糧食流通到資本流通	302
貨幣化分房	304
住房改革的金融服務	305
管理住宅市場	310
已經壞掉的醫保體系	313
社會保障改革	314
養老金制度改革	316
新社會保障制度	318
收稅的來了	320
資本流通改革	322
第十章 WTO：龍來了	327
更多的事情	328
同意分歧	331
訪美	335
關於中國加入WTO的努力	341
談判開始	342
談判擱淺	343
總戰略家進來了	345
中南海會見	347
結語：朱鎔基卸任後的中國	349
反思	350
比喻	351
模式	353
幾點想法	354

Acknowledgments

致謝

“鮮豆漿，鮮豆漿，鮮豆漿……”每天早上，我都能聽到這樣的叫賣聲，傍晚，在太陽落山前，還能聽到一次。叫賣聲像是清脆的歌聲，在朽舊的瓦房頂上跳躍，穿越老北京城區的胡同。我就住在那裡的一個四合院裡。每天早上，當我打開院子的紅色木門時，就能看到這位顯得年輕的中年婦女。她蹬著一輛簡陋的三輪車，總是騎得很慢，睜大眼睛尋找客戶。

一袋豆漿賣兩角人民幣，相當於2.5美分。每個塑料袋都被仔細地封好。每次從她那兒買鮮豆漿的時候，我都和她聊一會兒。每天凌晨，在我醒來之前，她已經開始磨豆漿了。她在下午還要再磨一次，用來晚上賣。“冬天、春天和秋天的生意好。”她有一次說。“為甚麼夏天不好？”我問。“因為我的豆漿是現磨的，沒有防腐劑，天熱的時候很容易壞，所以買的人少。”她回答說，聳了一下肩，好像我應該知道豆漿買賣有季節差異似的。

她原來是工廠的工人。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那幾年，她工作的廠子倒閉了，就像本書討論的許多其他工廠一樣。她成了眾多下崗工人中的一個。除了從小就會做的簡單事情之外，她別無所長。沒有其他選擇，她只好磨鮮豆漿，賣給像我這樣的人。

四季如梭。在北京單調的、有如沙漠一樣乾熱的夏天，儘管知道不會有幾個買主，她仍蹬著三輪賣豆漿。秋天的時候，生意好起來，她也顧不上刺骨的寒風。到了冬天，晝短夜長，胡同裡一片寂靜，我能聽到她的叫賣聲刺破凌晨時寒冷的黑暗，成為我的起床鈴。春天來了，豆漿小販被雨澆得透濕，卻仍然蹬著三輪車在胡同裡穿行，每天早上，每天晚上。

傍晚，當我坐在家裡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很難把她的聲音從腦海裡趕出去。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女人總是在那裡提醒我那樣的磨豆漿、賣豆漿的小型私有企業主。她是許許多多下崗工人的代表，他們在中國打破鐵飯碗的過程中下崗了。在我的腦海中，她成了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的象徵，我每天都在觀察這一轉型。此外，她還是中國人民適應變化決心的象徵——當變化被強加於他們時。他們走出需要改革的國有部門，自己創業，資源卻少得可憐。

我經常估算這個女人的生意收入——兩毛錢一袋豆漿，乘上她蹬一趟能賣出去的袋數，一天兩趟，一週七天……夏季減少40%……我的計算結果總是一樣的。像許多其他中國人一樣，她能否維持生計取決於對通貨膨脹的抑制。

這個念頭讓我寫出了“受管理的市場化”(managed marketization)

這個詞來形容朱鎔基的經濟模式。朱鎔基在擔任負責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時，通過嘗試、錯誤和成功，漸次開發出這個經濟模式。在當總理的時候，為了使中國告別過去，進入21世紀，他擴大了受管理的市場化的範圍，用於打破鐵飯碗，重建市場驅動的現代經濟框架。

朱鎔基總理曾經對我解釋說：“如果人們懷疑你的政策，即使它是正確的，也很難執行，不會產生任何結果。”這裡的關鍵因素，即判斷中國眾多人口對新變化接受程度的能力，就是朱鎔基所說的“社會心理效應”。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過寫一本朱鎔基本人的傳記，我想講述的是一個國家的轉型過程。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的改革政策正如鄧小平說的，像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方法是不確定的、謹慎的，方法本身並不能被稱為經濟轉型模式，而是關於如何前進的原則。然而，如果我們做一回“事後諸葛亮”，一個一個地回顧曾採取的政策、做出的決定，以及它們如何被用來應對“過河”的困難，那麼，我們有理由說，一種經濟模式的基礎——適用於發展中經濟和轉型經濟的模式——已經成功地在中國運用。

中國模式獨立於主流的發展模式，還常常與它們抵觸。總部設在華盛頓特區的大多數跨國機構和學術智庫（“華盛頓共識”）是這些主流模式的鼓吹者。事實是，中國模式有效，其他模式沒效。

就個人而言，這本書代表我自己在中國的全部工作和經歷，跨度為20世紀90年代的整整十年。寫這本書需要回顧中國的過去，把各個片段連接起來，把我在此期間的所見所聞寫出來。我感謝北京的許

多人，他們幫助我理解、領悟中國的巨大變化和彼此關係。這些變化發生在一個非常短暫而集中的時間段。我從朋友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但不幸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我不可能在這裡提到並感謝所有這些人。我只能希望他們能夠讀到我的致謝，理解我在字裡行間所表達的謝意。我感謝所有參與寫作過程卻不能在此被提及的人。

然而，我必須特別感謝三個人，他們撥冗向我提供了他們對中國改革的看法。他們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部長）王岐山*、副主任（副部長）李劍閣*、司長王水林（現任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師）。在“受管理的市場化”過程中，為了我理解那些政策背後的挑戰和理由，這三個人給了我極大的幫助。我與中國人民銀行龐繼英的交流長達十年，大大有助於我理解中國外匯和貨幣政策的複雜微妙。在感謝這些人的同時，我必須說明，這本書代表我個人對中國一些事件的因果排序和理解。本書引用的所有講話和討論都是我自己翻譯的，不論任何人對本書的任何觀點或事實有歧義而提出任何問題，其責任完全都在我自己，與幫助我寫這本書的人無關。

我要特別向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表示謝意。他和中國的交往年頭更長，在百忙之中為本書寫了序言，與我們分享了他對中國改革的遠見卓識。我還要深深感謝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素帕猜·帕尼帕迪（Supachai Panitchpakdi）博士，對於中國

* 王岐山：2007年任中共政治局委員，2008年任國務院副總理。——編者註

* 李劍閣：2008年7月擔任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編者註

“受管理的市場化”和加入WTO對將來這一過程的影響，他在本書的前言中介紹了他的看法。

感謝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他們相信並支持我成功地完成這本書。我必須坦白，當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亞洲事務副總裁Steven Miron和發行人Nick Wallwork第一次來北京看我的時候，我讓他們坐著一直看完了朱鎔基的電視訪談直播，然後才開始和他們討論寫書的想法。我感謝他們的非凡耐心和持久熱情。我還要感謝John Wiley & Sons的編輯班子，尤其是我的編輯Janis Soo，還有Adeline Lim、Ira Tan和Derek Lee。我特別感謝老同學和20年的朋友Wing K. Yung，他賞識我的觀點並督促我寫出來。在我寫這本書期間，我的妻子Eileen Chen Kaiyan不知疲倦地予以支持和鼓勵，在此特別鳴謝。

龍安志

北京

2002年2月

Preface

序言

我第一次訪問中國到現在已經四分之一多世紀了。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我頻繁地訪問中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一次又一次地讓我震驚。我對中國的成就充滿敬佩。我毫不懷疑在今後幾十年裡，中國的前進將持續下去。有相當一些歐洲人和美國人，主要是經理人員，對中國的經濟進步有一些了解。他們預測中國將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他們可以銷售產品的市場。但是，他們往往沒有料到，中國同時也會成為一個出色的出口國，甚至是高科技製成品的出口國。在航天與航空、核電站、化工產品、信息和交通技術、物流和環境技術等方面，中國將發展成為主要的競爭者。中國還將進入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頂層，其中包括生命科學與基因技術。當然，為了給幾億中國人——他們將受到農業現代化和所說的國企現代化的影響——提供就業機會，所有這些都是必要的。為此，中國需要國際合作——無論是科學或技術合作，還是企業和經濟交流。

作為中華民族的朋友，我歡迎龍安志所寫的這本關於朱鎔基的書，因為許多西方人難以理解中國改革過程產生的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對他們來說，本書不失為一本大開眼界的讀物。還有太多的西方知識分子、政客和教授，急於告訴中國人如何前進。但是，他們的大多數對中國漫長的歷史一無所知，對毛澤東時代晚期和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了解甚少。所以毫不奇怪，他們開的藥方根本就不對症。

在江澤民的領導下，朱鎔基對經濟改革採取了實用主義的做法，以鄧小平正確的基本原則為基礎，使這個國家走上了“零星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的成功歷程。朱鎔基的任期就要結束了。他的繼任者將面臨艱巨的任務，以繼續他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方法。

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總理（1974—1982）

2002年2月

Foreword

前言

從計劃經濟向更多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轉型，是一項最複雜，有時是折磨人的工作。從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轉型所必需的基本要求——意味著廣泛的機構調整，比如，中央銀行職能的調整、價格機制的調整和財政政策導向的調整；還不得不保留大批政府官員，給他們安排監管者的新角色，同時讓他們放棄過去在經濟中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的雙重功能。

有幾個國家想加速轉型過程的嘗試，想超越建立相應基礎和法律工具的必要醞釀期。這些嘗試失敗了。與它們不同，中國走上了一條漸進的道路，其特點是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是中國最具深遠目光的領導人之一，做出了幾項重大決策。其中一項是從1978年開始領導中國經濟走向“開放”。他的另一項重要遺產是提拔當時的上海市市長朱鎔基，讓朱鎔基牽頭管理中國經濟，使之沿著鄧小平20世紀80年代確定的改革方向發展。

龍安志的這本書成功地描述了中國20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過程中的複雜局面。朱鎔基是這個全面轉型時期的決定性人物。

朱鎔基經濟思想的形成顯然經過了幾年的時間，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他在國家計劃委員會所做的各種工作。在那個早期階段，他試圖融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政策。這給他帶來了一些麻煩，也帶來了一些考驗與磨難。朱鎔基的直言、堅定和果斷等顯著個性令人讚歎，使他準確地實現了他煞費苦心制定的經濟調整措施。

不管作者選擇甚麼詞彙來描述中國的經濟管理方式——社會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受管理的市場化——中國模式的主題牢固地建立在實用主義因素的基礎之上，與“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不同。整個轉型過程是漸進的，採用市場和不斷改進的計劃體制作為基本的經濟運行模式，同時改造國內生產結構。朱鎔基的政策方式——與傳統做法保持一致的宏觀管理，少許而適時的微觀調整，並仔細地保持兩者的平衡——與中國總的實用主義態度之間天衣無縫。

在果斷處理20世紀90年代初惡性通貨膨脹的時候，朱鎔基完全掌握了中央銀行，給它配備了一個真正獨立的政策平台，以對付即將來臨的經濟泡沫。傳統措施與經典的指令經濟學措施並行不悖，前者控制貨幣供應和提高利率，後者控制貸款和價格。朱鎔基忠實於他的原則，利用通脹的機會提出了金融和銀行改革的全套方案。這一組16條控制措施使通脹降了下來，成為朱鎔基宏觀調控政策的最初框架，為人們以後所熟知。後來，他採取了類似的措施，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經濟減速。在這種情況下，他把財政支出——宏觀調控

的一個基本工具——作為刺激國內擴張的主要因素，同時使用行政手段增加全國假日，鼓勵更多的私人開支。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朱鎔基保持人民幣匯率不變，幫助控制了危機的影響。他的這個決定得到了廣泛喝彩。從1994年1月起，中國正式採用人民幣的“管理浮動”（managed float）機制，這個保持匯率穩定的政策似乎是又一項宏觀調控措施。然而，沒有甚麼比這個說法更遠離事實：中國實際上沒有必要改變匯率。它的理由是不變匯率政策可以輕鬆地用古典市場經濟學的原理加以說明：

- 中國有將近2000億美元的巨額外匯儲備；
- 中國有一連串的往來貿易順差；
- 中國對資本項目仍有控制，可以防止任何對人民幣的不當投機。

在朱鎔基的“受管理的市場化”方法中，經濟和行政改革覆蓋了一切：金融部門、國有企業、農業和住房。它們都經歷著深刻的變革。朱鎔基非常清楚地了解，為了保持並推動所有這些改革，外部動力極為重要。儘管當時國內有反對意見，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開始時也缺少合作，加入WTO的路上佈滿了荊棘，但這一點說明了朱鎔基為甚麼仍致力於中國的入世談判。1999年11月，朱鎔基個人直接介入，挽救了中美代表團行將破裂的談判。這位戰略大師的點睛之筆再次證明了他融合了現代管理的精明和中國的實用主義。

因為本書的內容，龍安志將會得到很高的評價。他遊刃有餘地解釋了似乎為中國所獨有的市場與控制經濟的概念。在中國這份成功方案背後，實際上並無神秘可言。畢竟，朱鎔基的思路以理性的經濟

邏輯為主要基礎。不過，與經濟邏輯相結合的還有額外的實用主義成份和對中國現狀和文化的深刻了解。中國文化不要求主流機構提供臨床診斷，這些機構應該更謙恭地研究朱鎔基巨大成功中的概念框架，正如這本書所展現的那些。

素帕猜·帕尼帕迪 (Supachai Panitchpakdi) *

2002年2月

* 2002年9月就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編者註

Prologue

引言

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鎔基

1998年3月22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朱鎔基為總理。在隨後舉行的首次新聞發佈會上，朱鎔基說了以上這些話，贏得陣陣掌聲。三年之後，在2001年3月15日，記者問朱鎔基總理是否會在第一個五年任期結束之後退休，朱鎔基又重複了這些話，全場再次興奮不已。

這次，所有在場的中國人都大為感動，因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曾被周恩來總理（1898—1976）引用。周恩來實際上是引用諸葛亮的話。將近兩千年前，諸葛亮是三國時期蜀國的軍師和丞相。

對中國歷史有更多了解的人則在另一個語境中理解朱鎔基的聲明。

諸葛亮生活簡樸，不計官位，拒絕榮典。他仍然作為孔明大師——“最明白”者——為中國人所了解，並被所有華人當作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樸實、最深刻的戰略家。

Introduction

楔子

古者國有危難，君簡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恃功能而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將受詞，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諸葛亮

（〈將苑·出師〉，《諸葛亮集》卷四，第82頁）

上海的冬天

上海的冬天會很冷，空氣中瀰漫著比雨小、比霧濃的潮氣，陰濕寒冷地黏著這座城市，直到春天來臨。然而，對於居住在北京的人來說，上海可以讓他們暫時躲避攝氏零度以下的寒冬和從蒙古颳來的、夾雜著沙土的狂風。鄧小平生長在四川薄霧籠罩的河谷中，所以他在晚年喜歡去上海過春節並不奇怪。春節是家庭團聚的日子，鄧家——家長他自己、夫人卓琳、三個女兒、兩個兒子，還有許多孫輩——在晚冬的時候，一大家子出發去上海過傳統的節日——春節。1989—1991年在上海的日子裡，通過他的一些觀點，鄧小平了解並理解了上海精幹的市長，一個名叫朱鎔基的人。

1989年春節期間，鄧小平並沒有在上海休息。他專心聽取了朱鎔基關於經濟形勢的工作報告。給鄧小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朱鎔基思路清晰而且坦誠，不僅具體地討論了上海的經濟形勢，還談到了全國的經濟，引用統計數字時不看筆記本——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標準配置。實際上，朱鎔基從來不帶筆記本。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所有數字都記在腦子裡。

在1989年，鄧小平擔心的是如何讓中國經濟前進到下一個階段。這讓他寢食難安。鄧小平相信，國家計劃是一條死胡同，而中國的官僚機構與計劃經濟體制糾纏在一起，影響經濟增長，挫傷企業家士氣。鄧小平的另一個擔心是如何管理一個潛在的超大型市場經濟，他害怕中央政府可能失去控制。此外，他感到，如果貧富差距擴大，

社會混亂將影響中央維持那些地區穩定的能力。這樣的局面很容易導致經濟混亂，可能把國家拖入危機。

1991年2月，春節，鄧小平又回到了上海。朱鎔基市長提出了大膽的計劃：開發浦東經濟特區，帶動長江三角洲。這與中國南部沿海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特區是一致的，那是鄧小平自己原來倡導的想法。不過，朱鎔基的想法比鄧小平原來的又邁出了一步。他不談製造業和工業，他強調說，金融、貿易和基礎設施開發應該成為浦東發展的先導因素。鄧小平聽後，感到朱鎔基對經濟發展有一些新想法，可以更廣泛地加以運用。這次上海之行，鄧小平還和朱鎔基談了一會兒自己的想法，更確切地說，讓朱鎔基去國務院當副總理。

“改革需要新思維，”鄧小平對朱鎔基解釋說，“還有，改革應當採取和前十年不同的措施，在新形式下探索新路子，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帶來的好處不是永遠的。比如說，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間的關係。有的同志認為，計劃經濟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多年的經驗證明，這個觀點不符合實際情況。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它們本身不是判斷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標準。”

鄧小平接著指出：“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防止僵化。我們不能說，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你不能說外國投資和自力更生是對立的，不能說外資可能影響我們的獨立自主，要小心使用。你不能說深化改革和調整國家管理是對立的。這些改革（指鄧小平的改革）證

明是正確的、有效的。”

鄧小平的觀點是，他自己的經濟改革已經通過實際應用得到證明，現在是中國經濟前進的明確方向，不能後退。鄧小平還強調，為了繼續推動經濟前進，必須有壓力，同時不能以失去控制為代價。

“根據我的理解，”鄧小平補充說，“這些問題今天仍然存在。思想已經解放了的部門將進入新的一頁，那些思想不解放的……將來無法完成工作。”在和朱鎔基的談話中，鄧小平要求幹部“解放思想”，對朱鎔基特別重要的是，他被授權“調整國家的發展戰略”。

鄧小平實際上想讓朱鎔基牽頭管理經濟。鄧小平很清楚，過去十年，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經濟需要調整和前進，可能進入他自己從未見過，甚至還沒有想像到的領域。簡而言之，他知道中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需要一個領導人。鄧小平想為他的經濟改革找一個政治繼承人，能夠繼續沿著他確定的方向，領導中國經濟進入新階段。在和朱鎔基討論這些問題時，鄧小平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像這位長者的大多數思考一樣，他已經做出了決定。

從長沙到上海

1928年10月1日，朱鎔基出生於湖南的省會長沙。朱鎔基從來沒有真正認識過他的父母。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母親去世時他也只有30歲出頭。朱鎔基在他的伯父家長大。在這種環境中，沒有人覺得朱鎔基會有很好的前程，更不用說成為中國的總理了。然而，生

活的艱辛造就了他堅強的性格，給了他驚人的毅力。這些是在更優越環境中長大的人永遠不會有的。

和朱鎔基共過事的人都說他有非凡的記憶力。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過程中，一位美國外交官多次在會議上與這位總理相遇。他驚歎於朱鎔基對細節的注意，稱他的記憶力是“勞斯萊斯”。朱鎔基在童年時代就喜歡閱讀。只要有一點零錢，他就去長沙的舊書店。所有賣書的老人都認識他，喜歡他，給他買的書打折——朱鎔基在經濟學上的第一課。

朱鎔基在少年時代喜歡文學。有趣的是，他所喜歡的書與鼓舞了毛澤東的書大多一樣，比如《水滸傳》。這部小說講述了社會棄兒與命運搏鬥，最後成為英雄的故事。朱鎔基能夠大段大段地背誦這些小說，這種能力不會白費。儘管他家無力給他提供較好的教育，但他卻是一個出色的學生。從中學開始，他都靠獎學金維持學業。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朱鎔基回到了長沙，進入城裡最好的中學——省立一中。勞安也是該校學生，以後成為他的夫人。在這所學校裡，朱鎔基對文學的熱愛讓他發展成一名出色的作者。後來當了上海市長，他經常與上海的文學圈子聚會。一次他開玩笑說，他“從政的決定是偶然的，是一個錯誤”，並表示“後悔”，因為他更希望是個作家。那些藝術家和作家也開玩笑說，儘管他沒有走上文學之路，但他們同樣都在20世紀50年代被打成了“右派”。

作為上海市長，朱鎔基經常給當地的報紙雜誌寫文章或者評論，為他在上海的知識圈和文藝圈中贏得了許多尊重和欣賞。幾年之

後，作為副總理和總理，朱鎔基繼續自己寫講話稿，不像其他領導那樣依靠秘書或助手。作為國務院總理，他經常在大批政府官員面前講話，把辦公室為他準備的正式講稿拿出來，漫不經心地放在一邊。然後他自然地討論當時的話題，對提問的回應是開放的，沒有遲疑。

年輕的時候，朱鎔基熱愛京劇，十多歲時甚至還能表演。後來，早年的興趣給他帶來了莫大的政治好處。京劇自清朝時起就很流行，朱鎔基喜愛這門藝術，能整段地詠唱。這有助於提高他親民的形象。在上海當市長的時候，人們經常在官宴上請他唱一段，他也經常“從命”，而且不需要伴奏。京劇是中國文化的象徵。朱鎔基訪問美國白宮，當他經過掛有美國總統畫像的門廳時，他在亞伯拉罕·林肯的畫像前停了下來。朱鎔基指著畫像說，美國內戰時期，“當南方想獨立出去的時候”，是林肯使用“武力統一了國家”——明顯是在和台灣問題做比較。“我們應該向林肯總統學習！”朱鎔基聲明說。聽者無不驚聳。

朱鎔基在美國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剛才在克林頓總統的辦公室看到了林肯總統的肖像。我想當年林肯總統為了保持美國的完整，反對獨立和分離，不惜使用武力，我們應該向林肯總統學習。”

計劃的陰影

從清華大學畢業的時候，朱鎔基已經是一名中共黨員。1951年朱鎔基只有23歲的時候，黨把他派到東北地區擔任東北工業部計劃

處生產計劃室副主任。當時東北的一二把手分別是高崗和李富春。朱鎔基將發現他捲入了改變中國進程的決定性的經濟試驗。根據指令計劃的觀點，高崗建立了一個經濟領導小組，叫“五虎將”。經濟學家馬洪是五虎之一，朱鎔基被指派到他手下工作。後來東北的蘇聯經濟學模式試驗被保持下來，成為全國的模範。

當國家計劃在東北扎下根之後，馬洪被調到北京，進入1952年11月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他把朱鎔基也帶到了國家計委。朱鎔基很快發現，他的才華有了用武之地。他被任命為李富春的秘書。李在新政府中出任權力很大的國家計委主任。朱鎔基由此進入了負責中國工業和經濟的中央計劃機構的最核心部門。

關於“宏觀經濟學”——計劃工具和市場工具的融合體——朱鎔基已經有了他自己的想法，並且在會議上公開表達這些觀點。他說了幾點意見，反對使經濟過熱，認定領導層設定了不切實際的目標，這是他特別反對的。他經常在會議上與同事辯論宏觀經濟政策，已經帶有倔強的特點。

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朱鎔基公開直言，批評“大躍進”時期採取的政策。這一段可以公開表達意見的時期迅速走向1957年的“反右”運動。朱鎔基怎麼也算不上是個右派。然而，當時的計劃系統要求每一個單位都指定一定比例的“右派”。

1958年4月，朱鎔基遭國務院人事處劃為“右派”，被踢出了中共。朱鎔基痛苦萬分，爭辯道：他只不過就經濟政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並不代表他反對共產黨。但他的辯護並未奏效。後來，朱鎔基

和許多其他的右派一樣，被下放到農村地區，在那裡喂豬、養羊、掃廁所、幫廚，足足勞動了五年。在幹活的時候，朱鎔基的背部受傷，落下的毛病到現在還一直折磨著他。

朱鎔基總理很少談到他的這段經歷。然而，在清華大學動情的告別演講中，他回憶了這段時期：“我曾有過20年（1958—1978）沒有黨齡的日子，但是那些日子裡，我從來沒有放棄我的信念。”

中國更貧窮地區的艱難使朱鎔基了解了農村的生活。後來當國務院總理的時候，他利用了這些知識。他學會了種小麥和玉米，學會了鄉村經濟的微觀計劃管理。他認識了各種各樣的農村人，學會理解他們的需求和他們思維的心理。在制定糧食流通政策和縮小城鄉收入差別的努力中，這種理解展示了出來。這兩項政策是他作為總理提出的一攬子改革的後半部分。

1962年，當“反右”運動開始平靜下來的時候，朱鎔基回到了北京，在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當了一名普通的老師。他童年時學習歷史和文學，在清華時工程學學業突出，所以他幾乎可以教所有的課程。他的技能迅速得到承認，上層聽到了關於他的能力的評價。他很快被召回到國家計委，在國民經濟綜合局當工程師。朱鎔基還沒有被恢復黨籍，所以他的正式頭銜只能是工程師，而不是正式的行政級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朱鎔基再次被打入“另冊”。到1970年，他又回到農村，到了“五七幹校”。此後的五年中，朱鎔基又在養豬、打掃豬圈了。今天的許多中國人相信，艱苦的勞動、

令人傷心的艱辛，都證明了一句古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朱鎔基的幾次起伏與鄧小平的經歷很相似。在許多中國人心中，與朱鎔基同列於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員可能沒有經受過這種毅力與奉獻的考驗。

1975年，當“文化大革命”行將結束的時候，政府開始把幹部收攏回他們原來在北京的單位。但是，朱鎔基卻被重新分配到石油工業部當技術員。石油工業部部長康世恩是他在清華的老同學，給了他收發信件的行政工作。然後，朱鎔基被派到石油部廊坊管道局工作。

朱鎔基被提拔到公司的計劃部門。他領著一群年輕工人在農村翻山越嶺，把供電線路架設到油田。他運用自己的工程知識設計圖紙，親自帶隊到野外指揮安裝和連接。他參與所有階段的工作，從設計、計劃到運用和實施——這也是他後來的特色管理風格。

到1978年，鄧小平復出並鞏固了權力，要求全面重新評價黨和政府以前的政策。朱鎔基屬於鄧小平決定“平反”的那批人。

朱鎔基以前的經濟學導師馬洪也在平反之列。鄧小平決定放手使用人才。他很快把馬洪召回。馬洪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並出任所長。他還記得一位非常刻苦的學生，於是找到了朱鎔基並把他帶回北京，幫助研究如何振興中國經濟。

1979年，朱鎔基擔任工業經濟研究所的室主任，然後一直升到國家經委副主任。經委主任是他的另一位老朋友袁寶華。袁也曾經在東北局工作，擔任工業計劃主任。1983年，朱鎔基被調到上海，開始時在江澤民手下當市委副書記。後來江澤民被提拔到中央擔任中共

中央總書記。朱鎔基從1987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市委書記，直到1991年鄧小平把他調到國務院擔任副總理。

受管理的市場化問世

鄧小平把朱鎔基提為副總理，分管經濟和金融事務。

朱鎔基早年是馬洪的學生，東北地區在中國最早採用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朱鎔基在那裡工作了數年。毫無疑問，他是在指令體系下，而不是通過市場經濟學成長起來的。所以，計劃體制確實影響了他的思維方式。要解釋他為甚麼能把市場經濟與指令經濟的工具放在一起，卻對這一組合沒有絲毫的不安，就必須理解他個人的歷史和經歷中的這一事實。和鄧小平一樣，對朱鎔基來講也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對意識形態或“主義”的理論辯論。朱鎔基的決定取得了效果。雖然他的經濟管理方式可能會讓正統學院派理論家——如勞倫斯·薩默斯或傑弗里·薩克斯——難以接受，但是，朱鎔基肯定能得到講求實際、事必躬親的企業管理者——如傑克·韋爾奇或比爾·蓋茨——的掌聲。所以，在中國國務院以及與他最接近的部委中，大家都稱這位總理為“朱老闆”。這可沒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朱鎔基做出的嚴厲的、有時不太受歡迎的決定迅速得到實施，指導中國度過了這一時期。要理解這些決定，就必須把它們放到20世紀80年代的環境中去，當時中國採取的促進增長、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尚不成熟。朱鎔基為以下目的採取的政策實際上都是相互聯繫

的：解決中國複雜的三角債（在1992—1998年執行），控制通貨膨脹（1993—1996年），軟著陸和增長管理（1994—2000年），亞洲金融危機（1997—2000年）。這些政策或被前後相關的事件聯繫在一起，或被朱鎔基倡導的政策聯繫在一起。儘管許多外國觀察家把這段時期看作是不確定的，但它實際上是非常連貫的——就朱鎔基的管理風格和受這種風格影響的政策而言。

在20世紀90年代轉型的關鍵時期，朱鎔基發展了他獨特的經濟管理方式。在歷史性轉折的年代裡，朱鎔基先擔任負責經濟和金融事務的副總理，後擔任國務院總理。他把貨幣干預和財政干預的工具——兩者都是西方市場經濟所接受的——和帶有指令經濟——他正是在這個體制下接受訓練的——特點的強制行政手段結合在一起，成功地指導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毫無疑問，他的最大功勳就是以大手筆引導中國度過了轉型的內在險阻。在更深層次上來說，朱鎔基為轉型經濟學創造了一個實用方法，通過他在中國的實際運用加以檢驗並得到證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理論，這個方法值得人們接受。

我無意把本書寫成朱鎔基本人的傳記。我的本意是講述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的故事。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本書可以被看作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金融和經濟傳記。

在這些關鍵的年份裡，朱鎔基先是負責經濟和金融攤子的國務院副總理（1991—1998年），然後是國務院總理（從1998年到本書寫作時），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具劃時代特點的人物之一。本書探討的決策過程是朱鎔基親自參與的，這些過程制定了解決各種經濟和金

融障礙的方案。在經濟關鍵岔路口採取的這些決定把中國引向轉型，使中國成為今日之中國。

中國經濟轉型的故事也是在朱鎔基積極管理下提出或實施政策的故事。在本書寫作時，朱鎔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三號人物。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的職位都比他高。毫無疑問，在中國和外國的許多人心目中，過去關鍵十年的大多數重要的金融和貨幣決策都是在朱鎔基的辦公桌上產生的。當然，在經濟、金融和貨幣管理問題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尊重朱鎔基的判斷，最後在大多數重要問題上對他的決定給予集體支持。

本書第一部分選取重要事件來說明中國的轉型，講述艱難決策的故事。這些決策最終催生並主導了這一時期的變革。1994年惡性通貨膨脹達到21.7%時朱鎔基的控制措施；關閉違規金融機構，其頂點是廣為宣傳的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倒閉；清理三角債的努力；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保持高速增長；與這些事件相伴隨的中國經濟的戰略調整。它們都是轉型期的標誌性旗杆。在這些情形下採取的政策是中國轉型道路上的里程碑。事後看來，它們的累積效果構成了經濟發展改革的框架，本質上是一個值得國際承認的新模式，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

本書第二部分集中談朱鎔基在他總理任期內提出的改革。朱鎔基把這些改革概括為“一個確保”——高增長、低通脹和貨幣穩定；“三個到位”——在三年時間內改革銀行系統，扭轉國有企業虧損，把官僚機構減半；“五項改革”——包括糧食流通、醫療和

社會福利、住房、稅收和資本流通。本書還討論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一事，其背景是朱鎔基為下一階段的轉型和發展做準備。這正是鄧小平敦促他做的。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處理經濟和金融難題時使用的措施有成功，也有失敗。朱鎔基對此了如指掌，也了解中國大眾的反應心理，這些都影響到他對自己改革方案的管理實施。另外，朱鎔基非常深刻地了解在此期間這種心理的演變。他的政策因此適應這種心理反應。簡而言之，他了解大眾情緒的阻點，知道可以把改革推行多遠而不會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反應，否則大眾反應可能使這些改革出軌。

在俄羅斯、東歐、中亞、蒙古國、印度尼西亞、韓國，或其他任何轉型經濟體中，執行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世界銀行的改革措施，受到了華盛頓特區和嚴重親西方的國際媒體的讚揚。但是，人們必須真誠地問一句：這些改革中有多少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結構的產能培育？提高了生活水平？使這些經濟體煥發了活力？在這些國家中建立了社會和政治穩定？

中國跨過了同一時期，正如鄧小平所說，像摸著石頭過河一樣，走一步看一步。在波士頓或華盛頓特區的智庫，學術師爺們吧嗒出花裡胡哨的巫術經濟處方。中國沒有採用其中任何一個。但是，中國經濟卻在20世紀90年代以年均8%的速度增長。除了1993—1994年關鍵時期是唯一例外，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很低，常常還是負值。老的“鐵飯碗”體制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保險、養老金、商業化教育和住房。銀行系統接受了徹底改革——這一過程現在仍在進行——

以符合市場經濟中商業生活的新要求。在國有企業重組和精簡之時，民營企業興旺發達。儘管不可否認，在巨大的變革中，有一些人掉進了裂縫裡，但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全面改善。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沒有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方”吃藥。朱鎔基拒絕讓人民幣貶值。在那些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方”的國家，首先是經濟崩潰，然後是政治崩潰。與此同時，中國的外匯儲備直線上升，在本書寫作時達到200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中國走自己的路，從危機中走出來，比以往更強大。中國新的出口經濟蒸蒸日上，吸引西方和亞洲的製造商把生產轉移過來。同時，繁榮的國內消費新格局出現了，扭轉了中國經濟對出口的過度依賴——其他亞洲經濟之虎的致命之處。這些都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水落石出”。

朱鎔基的經濟改革模式包括：對經濟的“管理”，而不是自由放任；採用一系列經常是彼此無關的經濟干預工具和指導；領導封閉市場走向開放市場；改進而不是解散機構；允許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共同發展，而不是以此代彼。像很多中國的事情一樣，朱鎔基模式尋找中間道路，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實際上，在實踐當中，這類意識形態的詞彙沒有意義。朱鎔基模式注重實效，適應每一種形勢，但有眼光保持一定勢頭，總是把經濟進一步推向以市場為基礎的體制，不考慮理論包袱。有時，這意味著向經濟發出指令，使其走向市場。朱鎔基自己的“受管理的市場化”經濟模式由此產生。

當然，所有這些都罔顧主流經濟學的公式，就是波士頓的大學

所教授的、被“華盛頓共識”像宗教一樣遵守的公式。我們已經見識了“休克療法”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方”的結果。我們也看到了朱鎔基的“宏觀調控”政策的結果。把這些政策放到經濟發展理論新框架的語境中，“受管理的市場化”模式最能解釋這些政策，也最好理解。

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和總理，朱鎔基主持了轉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仍然是指令經濟，到了20世紀結束的時候，這些政策已經把中國變成了一個以市場為主的經濟。朱鎔基的風格確實包含“管理”中國的經濟，把它從計劃的框架中帶出來，進入市場體系的運作。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的轉變是朱鎔基經濟融合模式運用的成功見證。朱鎔基的改革為發展中經濟和轉型經濟貢獻了嶄新的經濟發展理論模式。也許，現在是承認這些改革自身價值的時候了。